

帝都・藝文・方志——明代李濂 《汴京遺蹟志》之以文代史與艮岳書寫

許東海^{*}

摘 要

李濂不僅將文學與史學兼容並蓄，並且前後分別以史志與「藝文」互補互證，其中就「藝文」而言，由於蒐錄歷代前賢時彥及其本人的詩文書寫，並且高據全書半壁江山之卷次與篇幅，從而形塑其以文證史迨至以文代史的著述旨趣，本文即以《汴京遺蹟志》中宋代艮岳相關文獻為例，主要藉由「山岳」與「藝文」的對讀，觀照其中文學與史學二者之書寫合流現象，因此《汴京遺蹟志》展現出李濂以文代史的帝都追憶及其方志書寫的重要意涵。

關鍵詞：李濂、《汴京遺蹟志》、帝都、藝文、方志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mperor Capital, Literature, Local History - Li-Lian of the Ming Dynasty Replacing History for Literature and Gan-Yuei Writing in *Bian-Jing Yi Ji Zh*

Hsu Dong-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Li-Lian combine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gether and also compare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rough the book. As for “literature”, there are great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 writing of the former prominent writers and Li-Lian himself in the book, which take place over half the book. He forms the topic of proving history with literature. Take Gan-Yuei writing of Song Dynasty in *Bian-Jing Yi Ji Zh* for example.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mountain” and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interflow of literature writhing and history writing. Therefore, the idea of replacing history with literature in memory of emperor capital and local history writing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Bian-Jing Yi Ji Zh*.

Keywords: Li-Lian, *Bian-Jing Yi Ji Zh*, Emperor Capital, Literature, Local History

帝都・藝文・方志——明代李濂 《汴京遺蹟志》之以文代史與艮岳書寫

許東海

一、緒論：李濂著述之博學多聞與文、史兼善

李濂是明代文化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學術觸角及成就豐碩淵博，著述亦頗為可觀，大體涉及史學、文學、醫學、數學等等不同文化層面，故清代學者錢謙益乃謂：「川父（李濂字）博學多聞，撰《汴京遺蹟志》為通人所稱，有《嵩渚集》一百卷。」¹此外，他所潛思編纂的《醫史》，為中國現存最早且重要歷代名醫人物傳記，學術價值頗高。²由此觀之，李濂誠乃明代無可忽略的重要學者，尤以他在文學與史學兩大文化範疇的著述，享譽當時，至於他的文學創作則以他晚期所躬自編纂的《嵩渚文集》100 卷為代表，至於史學貢獻則可以《汴京遺蹟志》為代表。其中《嵩渚文集》集中展現作者博學能文的卓越才思，故明張時徹為撰書首序文謂：

乙巳之春，會余以領藩至此，執手相勞苦。因與劇談往昔，評騭埏埴語罔弗契也。而公乃稍稍初期所論撰曰：願一言以序之。余乃卒業而復曰：文難言哉！文難言哉！夫好瞻麗者，遠沖雅之風；工峭麗者，寡渾融之度；尚枯寂者，少雋永之哉；媚纖縟者，乖中正之則；……非不侈然雄也，而綜攝未周，詮著多僻。譬之五色不比，不足以成文章；八音既缺，何以能諧韶濩？欲以名世，蔑矣。公博極群書，達觀眾品；羅體格於百氏，會神器於二儀；窮性命之微，核名物之跡；宣化理之原，敘倫類之的；洋洋乎與漢魏爭衡，晉唐方軌，非徒勸陳言以媒耀，沿流潦而享污者也。此其揚旌鑄範，……即彝鼎

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李僉事濂》，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莊嚴文化公司，1997），頁331。

² 參見馮迺郁：〈試論明代《醫史》的編纂特色及學術價值〉，《河南大學學報》43：5（2003.5），頁25-27。

竹帛之烈，又何尚焉。³

李濂的文學風采固然如是豐贍多才，此 100 卷詩文集，備極各類文體，依序爲賦（卷 1-2）；詩（卷 3-38）；史論（卷 39-41）；族譜（卷 42）；說（卷 43）；辯、解（卷 44）；對、答問、原（卷 45）；連珠（卷 46）；雜著（卷 47）；記（卷 48-53）；序（卷 54-68）；奏疏、議、狀（卷 69）；公移、題跋（卷 71-73）；銘（卷 74）；箴、頌（卷 75）；贊（卷 76）；策問（卷 77-78）；鄉賢傳（卷 79-86）；名醫補傳（卷 87）；傳（卷 88）；碑（卷 89）；書簡（卷 90-92）；行狀（卷 93）；墓表、墓碑、墓誌銘（卷 94-99）；誄、祭告文（卷 100）。其中值得關注者，首在上述文體次第，從當時李濂躬自編纂，修訂舊編乃至參與出版過程，皆一向審慎周密的嚴謹態度而言⁴，《嵩渚文集》的文體序列次第宜其別寓旨諦，尤其是開宗明義的前四大文學體類，依次分別爲賦、詩、史論、族譜等，如是編纂取向，對於一般文集的傳統慣例而言，不能不說是別具特色的。首先，將史論、族譜安排於百卷巨帙中的第三、四文類，誠屬罕見，即若文學史上經典地位的第一部總集《昭明文選》，總結先秦迄至六朝的眾多典範作品，全書共 60 卷，首標賦與詩兩大文類，但對於攸關史學、子學範疇，所謂「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的文章，基本上並不加以選錄，惟針對其中「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⁵的史論與歷史述贊作品特予擷選，但卻別置於卷 49 以後，並於其後續以論、箴銘、碑誄、墓志等諸類文體，故李濂《嵩渚文集》以賦、詩兩大體類冠全書之首，其後即續之以史論、族譜等深涉史學範疇的論述文章，儼然不乏《昭明文選》的編選旨趣及其傳統身影，則應出於李濂編纂自我文集的苦心孤詣，其中顯然映現作者平生熱衷的歷史閱讀、古蹟巡禮及其史學情懷，適如其重要歷史文獻著述《汴京遺蹟志》，即爲前後歷經數十年的學術成果，亦爲《嵩渚文集》開宗明義之文體類別序列，提供有力的具體註腳。本文即以《汴京遺蹟志》中宋代艮岳相關文獻爲例，並主要藉

³ 明·張時徹：《嵩渚文集·序》，《嵩渚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北：莊嚴文化公司，1997），頁 331。

⁴ 參見袁喜生：〈傑出的學者型出版家李濂〉，《河南大學學報》43：5（2003.5），頁 148-150。

⁵ 梁·蕭統：《昭明文選·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2。

由《汴京遺蹟志》中「山岳」與「藝文」的對讀，觀照其中文學與史學二者之書寫合流現象，並主要展現為以文代史取向之文化底蘊，作為筆者具體展開明代李濂文學考察研究課題的初始探索，庶幾為近年學術界雖已持續關注李濂學術成就論述，卻主要偏重於史學面向之研究趨勢，重新尋覓出另一長期為人忽略的文學天秤，從而揭示李濂文學與史學合流之豐富創作世界。

二、巡禮與書寫：李濂的歷史巡禮 與《汴京遺蹟志》的藝文編寫

《汴京遺蹟志》中主要「藝文」大宗，即詩與賦二大文類，若據其中所蒐羅的歷代作家及其作品之實際內容對照，則尤可注意者乃在集中體現於明代文學的涉足程度，與作者李濂本人作品的選錄與介入。從上述該書歷代詩歌各體的蒐列實際觀之，明代詩人及其作品，雖於總體數量上未能與唐、宋抗禮，但衡諸漢、晉與元、金等朝代，則不僅未見瞠乎其後，甚乃屢見超越，相形之下毫不遜色；易言之，就作者李濂本身而言，明朝當代詩人作品的編入，應可視為其體現「通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此一史學精神旨趣的文化實踐，而他濃郁深刻的史家情懷，又與其自少年讀書汴京遺跡吹臺時，即樂於閱讀《史記》、《漢書》等等著名史籍經典的學習歷程與情志軌跡深契，故平生曾與李濂「劇談往昔，評騭埏宇，語罔弗契也。」並於盛情難卻之下，為《嵩渚文集》撰寫前序的張時徹，即述及李濂年少淡泊學業，卻喜涉獵經史、古文的閱讀經歷：

初，嵩渚之為兒也，恚而啼，示之書，則止。……九齡而為詩句，輒出驚人語。閭長老大奇之，于是名聞里中矣。稍長攻古文辭，沉酣六籍，泛覽莊、老、遷、固言。時里生方急舉子業，誦說著撰，俱有隱括，而公獨弗之好也。⁶

而他平生對於歷史之古今世變及其興亡得失之理，尤所關情，並自年少以後即每每

⁶ 明·張時徹：《嵩渚文集·序》，頁1。

藉由憑弔汴京古蹟，書寫思古幽情與編輯京城文獻等三大主要途徑，作為展現自我深湛的史家情懷與史學素養，例如夷門、梁園與艮岳……等處汴京遺跡，即為其證，故張氏序文中即述及李濂早年即已熱衷汴京遺跡之歷史巡禮，並且展現以詩文創作，融會史學與文學於一爐的書寫特色：

乃集郡中才人，摘玄揆藻，暇則相與挈酒登古臺而遨，或聯騎出夷門，馳昔人舊走馬地，輒又慨然慕公子無忌、侯生之為人。而感時發憤，亦時見諸懷古之篇。⁷

此外，他早年即已開始著手蒐羅《汴京遺蹟志》前身《汴宋春秋》的史料文獻，誠如李濂《汴京遺蹟志·序》開宗明義並自我揭示的這段追憶：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為《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於篋笥中檢尋前稿，散佚罔存。於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⁸

可見他平生自少至老，或應舉前後迄於懸車致仕，皆深厚寄情於史學天地，故張時徹序文亦稱引李濂之自述：

公乃嘆曰：「嗟哉！士誠有遇乎，亦在所表也。漆園高隱，是著《南華》；子長幽廢，乃成國史。斯歸也，庶是以成吾志乎。」乃買田種藥，歸隱於大梁之墟，左右羅古圖史，閉門危坐，且作且述。⁹

由此觀之，李濂一生學術誠然深具史學色彩，即使涉及醫學範疇的《醫史》撰著，亦不離以史立言的書寫旨趣；至於其平生著述裡流傳最稱廣泛久遠的《汴京遺蹟志》固為其中典範，至於此書中幾佔半壁江山之卷帙比例的「藝文」詩、賦，則迥然殊異一般方志典籍往往將「藝文」門類視作聊備一格的書寫慣例，從而具體而微地映現《汴京遺蹟志》文學、史學二者合流的書寫特色及其精神旨趣。此外，李濂此一深刻而濃郁的文化取向，亦集中映現於作意將明代詩人及其作品，羅列於歷代前賢

⁷ 明·張時徹：《嵩渚文集·序》，頁1

⁸ 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蹟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

⁹ 明·張時徹：《嵩渚文集·序》，頁2。

之後，其中繼纂歷史遺緒，賡續汴京書寫系譜的內在文化意圖，與其自編平生著述《嵩渚文集》中優先安置「史論」與「族譜」二者次第，以體現其尊崇歷史承傳精神之書寫旨趣深契，並從而將《汴京遺蹟志》之明代詩歌書寫深化為別具歷史意涵的文化薪傳。

據《汴京遺蹟志·藝文》所選錄明代文士汴京書寫，其中辭賦固然闕如，然卷 21 迄至書本卷 24 之各體詩歌及長短句，則頗不乏作者李濂本人的作品，如前文之所敘列，其中如夷門、梁臺（吹臺）、艮岳等等汴京遺跡，皆為李濂詩歌屢見書寫的主要代表題材，同時李濂亦將明代前賢或其同時師友之近似書寫，蒐羅於《汴京遺蹟志》裡，以資形塑其以汴京遺蹟書寫為中心之明代文學巡禮群體，並進而結合漢唐宋元歷代前賢之同質詩文，建構以「藝文」為要目，且與汴京方志史學互為經緯表裡之書寫特色，從而彌補李濂對於一座歷史重要都城汴京面臨無志可稽的史學觀照及其文化遺憾：

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跡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丘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舊址之所在者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抑豈可少哉！……獨吾汴自五代以迄於宋，久為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丙午之夏，余避暑於南垌別墅，幽居寡營，神慮澹爽，乃稍親筆研，創輯《汴京遺蹟志》成。……聊亦摭故實，備考索，書慨惋，資譚噱，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¹⁰

以作者此序觀之，其中關涉汴京書寫的歷代「藝文」匯集，固為體現李濂對於帝都汴京「紀載之書無聞焉」的闕憾，並且此書在歷史王朝的時代軸線上，乃以宋代為主要中心，適如其書前凡例開宗明義所高揭「是編本為紀載宋都舊蹟而作。」然而於此之外涉及宋之前後，乃至明朝所修建之遺蹟書寫則「間亦附焉」¹¹，至於如前文所述，該書「藝文」亦蒐錄不少明代時賢及作者李濂本人的作品，顯然旨在「摭故實，備考索」之外，亦欲藉由明代「藝文」的入列，繼踵前賢，進而延續歷史隊

¹⁰ 明·李濂撰：《汴京遺蹟志·序》，頁 1。

¹¹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凡例》，頁 1。

伍群體之汴京書寫，尤其作者本人詩文的蒐錄，益形映現此一史學意圖及其書寫旨趣。由是觀之《汴京遺蹟志》除了前 11 卷涉及宋代東京汴都內外城、大內宮室、內外諸司、官署、山岳、河渠、寺觀廟宇、樓台園榭、岡坡井墓，與卷 12 至 13 載錄北宋皇帝紀年、官制、登科記、戶口、財賦、京畿縣邑、四園、五學、六更、十蹟、八景及靖康之難外，此書卷 14 迄至卷 24 皆為歷代汴京書寫之相關「藝文」文獻，並且依據作者撰述凡例所謂：「無關於汴京舊蹟者不錄，而錄之者各以體類，每體仍以世代先代為序。」¹²因此就書之結構而言，大體乃以前半的史料與後半的「藝文」，二者前後對照融合，從而展現文學與史學合流的書寫向度。由是觀之，深切的史學關懷遂成為李濂汴京藝文書寫背後的重要文化意蘊，而不僅徒拘囿於作者序文所謂「舒慨惋」等單純文學情志之投影，誠為《汴京遺蹟志》文學與史學合流的重要樞紐所在。

三、傳統與變創：李濂《汴京遺蹟志》 與宋元明地理志之「藝文」體例

李濂《汴京遺蹟志》藉由大量「藝文」卷次的排比鋪陳，從而體現以文代史旨趣的編寫取向，若由宋元以來地理志書的發展史觀之，固乃淵源有自。按歷代史書不乏「藝文志」的體例，如班固《漢書》，然就地理志書的譜系而言，迄至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等如是全國性地理總志，方開始結合「藝文」於地志之中，其中具體關鍵乃在：

以前的正史（地理志）中述及各地山川、古跡、風俗時往往涉及人物，但都很簡略，《元和志》亦未立人物一門。祇是到了北宋樂史《寰宇記》時才開始出現了重視人文的風氣，并在書中專門創設「人物」這一門類，并因人物而載及詩文雜事，體例為之一新，故《四庫提要》稱「後來方志必列人物、

¹²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凡例》，頁 4。

藝文者，其體皆始於（樂）史。¹³

《太平寰宇記》雖始以藝文資料載入地理志書，然猶未專立「藝文」一類的相關名目，但隨古蹟與人物而觸引之，例如卷一〈河南道·東京上·開封府·浚儀縣〉之望京樓謂：

望京樓，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綯重修，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¹⁴

此書藝文載記大體如此例，其中固不乏藉由詩文典故，載記汴京風物之意，同時卻也肇啓古代地理志書與藝文合流之書寫取向。至於宋代地理志書中具體以詩文等相關藝文作品專立門類品目者，從現存的地理志書觀之，主要出現在南宋，並且漸次形成一股流行風潮與撰述體例，其中地方志書可以范成大《吳郡志》與張津《乾道四明圖經》為代表；至於廣納國境各地之全國性總志，則首推王象之《輿地紀勝》與祝穆《方輿勝覽》，二書皆以山川名勝為其著述之命題旨趣所在，故皆重視對自然名勝與文物古蹟之載記與吟詠，從而深富人文氣息，尤其是體現在書中之詩文吟詠專立門類，誠然變創地改寫傳統地理學的撰述旨趣，故王象之《輿地紀勝·序》乃著意高揭此一變革：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元和郡縣志》）；九域有志（《元豐九域志》）；寰宇有記（《太平寰宇記》）；輿地有記（《輿地廣記》）。或圖兩戒之山河；或記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異同，考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夸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¹⁵

至於著述時間、性質與旨趣相近的《方輿勝覽》，亦專立詩文序記等藝文門類，以資登臨題詠之助，此與傳統類書之性質極為相近，故《四庫全書提要》謂：

¹³ 參見宋·王象之撰，李勇志校點：《輿地紀勝·前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頁136。

¹⁴ 參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1，頁22。

¹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3。

所記分十七路，各系所屬府州軍於下，而以行在所臨安府為首，蓋中原隔絕，久已不入輿圖，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書中體例大抵於建置沿革、疆域道理、田賦戶口、關塞險要他志乘所詳者，皆在所略，惟於名勝古跡多所臚列，而詩賦序記所載獨備，蓋為登臨題咏而設，不為考證而設，名為地記，實則類書也。然采摭頗當，雖無裨於掌故，而有益於文章，摘藻揆華，恆所引用，故自宋、元以來，操觚家不廢其書焉。¹⁶

由此觀之，藉由地理志書之此一新變，轉為騷人才士歌詠服務，從而異於傳統地志為君國服務的主要旨趣，誠然為宋代地理學的新變發展取向，亦是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祝穆《方輿勝覽》兩部宋代地理總志的重要特色。¹⁷

至於兩宋以來的地方志書，如前述宋初《太平寰宇記》注文中屢見歷代詩文之徵引，可謂首開地志與藝文密切結合的著述風氣，惟體例上尚屬明而未融的階段，故迄至南宋《輿地紀勝》與《方輿勝覽》二書始見堂皇昭揭；此外，就宋代地方志書與藝文合流的著述發展而言，亦至南宋時期隨著編修方志風氣的普遍而更趨顯著，例如張津《乾道四明圖經》與范成大《吳郡志》允為代表。其中《乾道四明圖經》全書共 12 卷，自卷 8 迄至末卷錄藝文之作，其中卷 8 為古賦、古詩、律詩、絕句、長短句；卷 9 與卷 10 為記體文；卷 11 為碑文、贊、傳、書；卷 12 為太守題名記、道士題名記。¹⁸這些以藝文為主的卷次將近全書半數，比例頗高，則其藉由文字題詠以展現該地自然與人文風華之旨趣，可謂昭然若揭；至於范成大《吳郡志》則於全書 50 卷中，以卷 49 及卷 50 專立「雜詠」之目，似乎比例偏低，然而實際上范氏乃採取變創性的化整為零策略，每每將相關詩文題記排比於全書諸卷注文之下，例如卷 16「虎丘」之下，廣蒐唐宋以來詩文題記，包括獨孤及〈夜宴序〉、皎然〈陪陸長源、裴樞遊武丘〉、李峴〈劍池〉、趙嘏〈虎丘贈魚處士〉、皮日休〈虎丘寺西小溪閑泛詩〉，及陸龜蒙、許渾、權德輿、白居易以下等等唐宋詩文題記共五十餘首作品¹⁹，則此書頗作意於藝文與方志合流之旨趣，固自毋庸置疑，此外該

¹⁶ 參見宋·祝穆、祝洙增訂，施和全點校：《新編方輿勝覽·附錄》（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239。

¹⁷ 參見李勇志：《輿地紀勝·前言》，頁 22-23。

¹⁸ 參見宋·張津等：《乾道四明圖經》，《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875。

¹⁹ 參見宋·范成大：《吳郡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 1 冊，頁 807-812。

書卷 49「雜詠」中又細分藝文作品爲八目，「一曰紀詠、二曰遊覽、三曰書事、四曰懷古、五曰題贈、六曰寄贈、七曰留別、八曰贈別」²⁰，尤可見范成大以藝文與地志二者彼此經緯以輝映吳郡歷史風華的撰寫旨趣。

由上述有關宋代地理典籍之全國總志或地方志書的初步審視，大體得以略窺宋代地理書中將藝文與地志融合的新變旨趣，並且此一以文入史，甚至以文代史之變創性著述體例，宜其成爲明代李濂《汴京遺蹟志》近全書卷數之半的「藝文」書寫的重要前代典範與歷史淵源；此外李濂又頗鑑於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蕪蕨猥瑣，無足觀者」，其中具體緣由固在作者深以孟氏書乃「識小之流」²¹的闕憾，另一方面從《汴京遺蹟志》的內容觀之，當亦深鑑於其書藝文氣息之不足，故乃轉而借鑑南宋以來融合藝文書寫於地理志書的新變取向，大量增加「藝文」門類之卷次與篇幅，甚至於全書於卷 14「藝文」之前的諸種門類中，亦參酌南宋范成大《吳郡志》的編撰策略，於各卷中隨機羅列藝文之作，從而體現《汴京遺蹟志》以文代史的著述旨趣，例如卷 4「山岳・艮岳壽山」先載敘其建造背景與山川文物，及其興衰流變，其次則又徵引羅列宋徽宗〈御制艮嶽記〉略文、僧祖秀《陽華宮記》、張淏《艮嶽記》略、《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洪邁《容齋續筆》、周密《癸辛雜識》、和維《愚見紀忘》、岳珂《桯史》等宋代以來相關文獻。由是觀之，李濂《汴京遺蹟志》頗借重於宋代以來的詩文題記與史料文獻。其次，亦由此映現李濂對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書「藝文」氣息，及其「以文代史」意涵不足之闕憾。然而自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迄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亦不乏揭示《東京夢華錄》「追述舊事，兼及國家祀典、里巷風俗。」²²或「固不僅歲時宴賞，士女奢華，徒以悵悵舊遊，流傳佳話者矣。」²³據此則李濂眼中此書「無足觀者」之主要關鍵，宜其不在「識之小流」，誠在此書「藝文」氣息及「以文入史」內涵之不足，故由《東京夢華錄》書中未見設立「藝文」相關卷次，又未明顯徵引

²⁰ 宋・范成大：《吳郡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1 冊，頁 1014-1020。

²¹ 語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京夢華錄》，參見宋・孟元老著，嚴文儒注譯：《東京夢華錄・附錄》（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343。

²² 宋・孟元老著，嚴文儒注譯：《東京夢華錄》，頁 342。

²³ 宋・孟元老著，嚴文儒注譯：《東京夢華錄》，頁 343。

詩文題記之作的著述體例及書寫現象，應可略窺箇中消息。並且此既深違南宋以來地志與藝文合流的新變取向，亦與李濂《汴京遺蹟志》以文代史的著作旨趣扞格不入，因此李濂所撰《汴京遺蹟志凡例》十條，其中至少有四條涉及「藝文」，故其書既承傳南宋以文代史的新變取向，同時實踐編寫者「補鄉國之闕文」之宿志，進而重新量身打造北宋帝都汴京之歷史文獻與文化論述。

至於明代方志編撰頗為繁盛，明成祖更為此於永樂 10 年與 16 年前後兩次頒布條例，規範修志體例，其中由翰林院制定的〈修志凡例〉17 則，為重要方志程式，其中主要依據《大元大一統志》而增益，內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池城、里至、山川、坊郭、鄉鎮、土產等等十五門類，卻以「詩文」殿末，故明代方志之書雖已上承宋代地志與藝文合流之書寫傳統，但顯與前述南宋《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乾道四明圖經》、《吳郡志》等地理志書亟重藝文的新變旨趣互見乖違，故明人葉盛云：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准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不可為法。況此書初為四六設，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充益之可也。²⁴

由是觀之，明代方志之學雖蔚然興盛，其中亦不乏詩文題詠之「藝文」類體例，惟其卷次比例及重視程度大體不及南宋王象之、祝穆等人之地理志書。此一內在旨趣的轉變，若以現存天一閣明代方志中有關河南地區的縣志為例加以審視，亦得以略窺其間流變與殊異。例如嘉靖儀封縣之卷次依序如下：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形勢、風俗、物產、田賦、戶口、職官、兵防、城池、黃河、公署、學校、科目、祠祀、陵墓、寺、宮室、古跡、名宦、人物、流寓、孝義、烈婦、藝文、遺文、災祥、雜誌等共三十類目。其中顯然映現以「體國經野」為旨的政教取向，「藝文」幾乎成為其中聊備一格的類目而已。至於《鄆城縣志·序》則高揭「欲成河南之總志，以續中州之文獻。」並謂「凡邑必有志，將使觀邑者恃此以慕一邑之勝，治邑

²⁴ 參見明·葉盛：《水東日記·寰宇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25，頁 250。

者恃此以酌治邑之宜是，非邑之盛典耶？鄆獨無志，是尹邑之責也。」故強調「提綱分目，例嚴義析，不失之陋而泯其真，不流於華而浮其實。」²⁵故此一方志全書共計 12 卷，其中卷 9、卷 10 為「文集」，主要內容蒐錄碑記類篇章，以作為當地方志的文獻依據之一，故該卷卷首有趙應式所撰小序謂：

文集者典籍之類也，說禮者於是乎據焉，論世於是乎徵焉，夫豈可易言哉！是文也工拙非所先，要皆醇乎一歸於正也，凜乎弗納於邪也，而又燦然其詳，秩然其整，則庶乎天下後世徵而據者在是矣。²⁶

至於卷 11「題詠」據卷首小序謂：

夫題勇者文人高士遇鄆之疆域，咏鄆之風物也，如韓如柳如杜工部如劉隨州，皆上薄騷雅，俯視曹劉，固高矣美矣，宜載之以式後人者，然竊有所未是焉，以為良有司不若歌真西山同胞一體之章，誦聶夷中醫瘡剜肉之什，耳聽心思而身體之，庶幾還剝棗烹葵之俗，臻耕田鑿井之治乎。²⁷

由此觀之，《鄆城縣志》雖設置卷 9 至卷 11 等三卷歸屬「藝文」之作，約佔全書四分之一卷數，但仍未跳脫以藝文聊備一格的編撰旨趣，顯然並未加以重視，故謂「固高矣美矣，……然竊有所未足焉。」易言之，以體國經野而攸關治體的文獻，誠然乃為明代方志的編撰主流重心，而上述與李濂《汴京遺蹟志》同撰於嘉靖年間之河南方志如《儀封縣志》、《鄆城縣志》等志書中，「藝文」作品的篇幅不多，卷次比例較低，誠然反映此一當代方志主要編撰取向，故其他如《濮州志》、《范縣志》、《歸德志》、《永城志》、《真陽縣志》、《商城縣志》、《通許縣志》、《太康縣志》、《陽武縣志》、《沈丘縣志》等等現存明代嘉靖年間方志，皆與《汴京遺蹟志》同屬河南範疇的方志書，基本上則呈現孤卷甚至四分之一以下卷次之偏低比例，誠屬聊備一格的編撰體例²⁸與其意涵。另一方面，從現存天一閣嘉靖年間明代方志觀之，其中唯一與《汴京遺蹟志》皆以全書半比例，展現「以文代史」的編撰

²⁵ 以上引文參見明·陳瓚：《嘉靖鄆城縣志·序》，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 59 冊，頁 481-485。

²⁶ 明·陳瓚：《嘉靖鄆城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59 冊，卷 9，頁 731。

²⁷ 明·陳瓚：《嘉靖鄆城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59 冊，卷 11，頁 871。

²⁸ 參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58、59、60。

特色者，則為古「冀州之地，共伯之國」，於唐初屬古共城之地的《輝縣志》，全書共計 10 卷，其中卷 6 迄卷 8 以「文章」為目，卷 9、10 兩卷則以「題詠」為目，易言之，這類「藝文」文獻占全書之半，明顯體現「以文代史」的編撰旨趣，故當時衛輝府知府劉希龍〈輝志序〉乃謂：「予見其山川之秀麗，人物之淳美，土產之饒裕，賢達之俊逸，兼以今古文字之盛。……故志所以風世道而以待豪傑。」²⁹從而成為共城輝縣的第一本方志³⁰，因此自此書體例而言，誠然亦別具「以文代史」的編撰意涵，惟其書或以力求體現共城輝縣三代直道之化民成俗及其忠厚民風，故雖以全書之半展現其地「今古今字之盛」與人文風華之美。然就其內容編次而言，則不及李濂《汴京遺蹟志》詳瞻分明，例如李濂所撰於卷 14 迄至卷 24 的「藝文」類目下，又細分為奏議、記、序、碑、誌、雜文、賦、詩、長短句，且進一步於詩歌中又別分各體如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等；至於〈輝縣志〉則以卷 6 至卷 8「文章」幾乎全為記體文，偶加入皇帝勒旨與碑文，且於卷 9、卷 10 中所載全為詩歌之作，但既未分體，於作者朝代及其作品題目亦皆未載明，如是種種皆足以對照出李濂《汴京遺蹟志》在明代方志書中以文代史的編撰特色及其典範意義。

四、帝都與文史：《東京夢華錄》與 《汴京遺蹟志》之帝都書寫

宋代著述已不乏諸家筆記中的艮岳敘寫，但相形之下，《汴京藝文志·藝文》則未見宋代詩歌明顯論述艮岳史事者，據此大體可以推知李濂當時應未見宋代文士以詩歌敘寫艮岳及花石綱事件，亦尚未大肆展開相關論述，故今考察《汴京遺蹟志》裡此類文字，惟見於卷 4「山岳·艮岳壽山」條下的諸家筆記，此外，於「藝文」

²⁹ 明·劉希龍：〈輝志序〉，《嘉靖輝縣志》，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61 冊，頁 1-2。

³⁰ 據劉希龍〈輝志序〉謂：「輝古共城，為衛輝屬邑，距西北五十里，舊未有志，志於知縣范玆也，去歲過縣以督文王，先生校士於彼，以輝志來請予，予歎曰：天下之事成於振而廢於因，汝可謂先務矣。」參氏著：《嘉靖輝縣志》，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61 冊，頁 1。

卷14蒐錄的宋人奏議、記、序、碑及雜文諸體作品，亦皆未見涉獵艮岳或花石綱等相關史事書寫之例，其中尤值得注意者，則是以書寫當代東京都城風華及其生活聞見著名的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竟亦未見任何著墨，故李濂乃不免感慨地說：

幽蘭之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勒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宋敏求《東京記》而作，……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徽宗常寧二年癸未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為詳備。但是時艮岳已成，梁臺上方塔寺俱在，而《錄》內無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³¹

至於北宋人以都城汴京為主要題材，所撰述之當代帝都書寫文獻，可以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為代表，是書所載大體為北宋徽宗崇寧到宣和年間之事，為作者於靖康之難後離京南下，追憶都城汴京繁華如夢的筆記史料，具體而微地映現南宋「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的當代文化風潮³²；然而此書尤為特殊者，乃在其中雖遍錄汴京的名勝佳景，卻於艮岳之事隻字不提，且「文字猥瑣，無足觀者」³³，從而成為明代李濂撰述《汴京遺蹟志》的主要背景與動機之一，即因作為北宋帝都及其鄉國桑梓的汴京，卻始終缺乏一本披卷縱覽的記載書籍，故歷數前代帝都書寫，並且獨以汴京為闕憾：

今關中有《三輔黃圖》、呂汲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錄》，……洛陽有楊佺期《洛城圖》、韋述《西京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臨安有《武林舊事》、周淙《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皆行於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必履壤觀風，詢宮問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懷古之情，自容已於臥遊之頃矣。獨吾汴自五代以迄於宋，

³¹ 明·李濂：〈跋東京夢華錄後〉，《汴京遺蹟志·藝文·雜文》，卷18，頁356。

³² 語出宋·周輝：《清波別志》，參見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序》（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1。

³³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序》，頁1。

久為帝都，而紀載之事無聞焉。幸微也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帙，蕪蕨猥瑣，無足觀者。余卯角時，聞先生長者，亟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夷門記》，頗為明晰，而未之見。間嘗徧叩城中藏書之家，暨海內博雅之士，咸亡有也。³⁴

由此觀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因內容及文字的完善不足，誠為李濂撰述《汴京遺蹟志》的重要緣由之一，但因《汴京遺蹟志》篇幅非巨，而詳於載敘遺蹟，較疏於排比史事資料，且全書一半篇幅蒐羅前人有關汴京詩詞歌賦等「藝文」書寫，於是清代始出現以史事資料豐富詳瞻著稱的周城《東京考》，堪稱近代汴京志集大成之作。³⁵相形之下，就北宋汴京帝都之書寫史而言，明代李濂《汴京遺蹟志》應具有承先啓後之意義及其地位，而此書顯然以「藝文」之搜羅排比見長，深寓以文代史的書寫意涵，至於清代繼踵而作的《東京考》則以史料之深廣見稱，兩書一文一史，前後輝映，堪稱明清汴京書寫史的雙壁。

至於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何以全然未見攸關北宋興亡的艮岳及花石綱記載，清代藏書家常茂徠以孟元老或即為宋徽宗時督造艮岳的孟揆，其人與北宋之亡不無關係，乃諱而不談，以隱蔽身分³⁶，然而無論孟元老是否即為孟揆其人，大體亦必北宋汴京官府中人，乃得以細說北宋汴京風華。³⁷據是則知《東京夢華錄》中有關艮岳書寫付諸闕如，相形之下遂亦彰顯《汴京遺蹟志》帝都書寫之一獨特價值及其重要文化意義。

其次，李濂《汴京遺蹟志》既重視藉由全書半數卷次的「藝文」書寫，載記北宋帝都，並寄寓興亡得失的史鑒意涵，則其中此起彼落的艮岳書寫，誠為不可缺或

³⁴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序》，頁1-2。

³⁵ 參見清·周城撰，單遠慕點校：《宋東京考·點校說明》（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3-5。

³⁶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謂：「余友鄧孝先藏道光壬辰常茂徠邦崖鈔本，常氏跋云：『艮岳為一時巨觀，且以萃天下之名勝，獨缺而不書。謝樸園序指為宣和諱，以余觀之，諱誠是矣，而為宣和諱則非。何則？花石之道，為太守朱勔；艮岳之築，專其事為戶部侍郎孟揆。揆非異人，即孟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也。推元老之意，亦知其負罪與朱勔等，必為天下後世所共責，故隱其名，而著其字。』孝先謂：『揆字元老，無他書為之左證，而前人讀書細心處不可掩。』云云。」參見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頁2。

³⁷ 參見嚴文儒：《東京夢華錄·導讀》，頁1-2。

的重要案例，此亦該書藉由獨特的艮岳及花石綱敘寫，凸顯其與宋代前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以追憶京師風物寄寓帝都繁華如夢的書寫旨趣互見出入之一具體關鍵。至於《汴京遺蹟志》中全然未見宋代吟詠艮岳之詩歌，其中緣由固非作者李濂摒棄不錄，當出自相關詩作之難求。其中原因之一，或即艮岳為皇宮所築之山林苑囿，故「艮嶽不惟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而李濂以《東京夢華錄》全書竟無一言以及之，當亦由是所致³⁸；其次，宋代南渡以後，雖「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但艮岳詩作畢竟罕所聞見，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源自南宋如上述地志書籍《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乾道四明圖經》、《吳郡志》等皆以南宋行政版圖為範疇，未能納入中原，故即使如據近人考證《輿地紀勝》此書或不乏殘存北方文獻³⁹，但畢竟資料殘稀，亦未得見相關的艮岳書寫，而南宋專敘汴京之載記，由《汴京遺蹟志·序》觀之，作者似乎僅見到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而其書又頗乏「藝文」文獻，乃視作「無足觀者」，如此李濂原來或可冀由南宋地志與藝文合流之便，蒐羅汴京艮嶽之作，顯然亦未如預期，此誠《汴京遺蹟志》未見載錄宋艮嶽詩文之一文化背景；至於見聞博洽，當時罕倫的宋敏求，曾著有《東京記》一書，專載汴京，此書南宋時尚見於官方與私人書目，但明代已未見收入書目，或即亡佚於宋、元之際⁴⁰，故李濂編撰《汴京遺蹟志·序》時亦以未見此書用資參考為憾。

五、樂遊與興亡：《汴京遺蹟志》之艮岳書寫

《汴京遺蹟志》雖源於作者李濂彌補當時關於宋代汴京未見正式帝都紀志的闕憾，但幾乎占據全書半數卷次的「藝文」系列，則具體而微映現作者以文寫史、以

³⁸ 參見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自序》，頁2。鄧序謂：「濂又惜其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錄內無一言及之。此由不明此錄體例，非親見視開者不錄，鐵塔容或偶遺，艮嶽不惟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也。所不錄者，尚有延福、靈霄，……只淡淡著一朱勔，則艮嶽、延福、靈霄不言而自見。」

³⁹ 參見李勇志：《輿地紀勝·前言》，頁37。文中以清人劉毓松推知此書原有實有地方各州載記。

⁴⁰ 參見宋·宋敏求，張保見校點：《河南志·前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頁8。

文證史，臻至以文代史的汴京書寫觀照，從而形成此書文學與史學合流的著述特色，因此其後清人周城《宋東京考》則以史學文獻的視角益形廣泛地蒐羅考察，於是較明代李濂《汴京遺蹟志》相關文獻豐富許多，但相對而言，大肆刪除李濂居全書之半的「藝文」結構，亦復成為清周城《宋東京考》異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的主要編纂特色⁴¹，換言之，周城以回歸史學向度的眼光，固然區隔明代前賢李濂文學與史學合流的書寫基調，卻也同時對照出《汴京遺蹟志》重視以「藝文」書寫汴京歷史，乃至於代言汴京歷史的重要深層文化意蘊。

李濂《汴京遺蹟志》卷4主要載錄汴京涉及歷史人物及其典故的山岳，實際上即以夷門山（簡稱夷山）與艮岳壽山二者為主。其中夷門山所涉及的歷史意涵超脫作者以宋代為中心的主體範疇，故以「間亦附焉」之姿，作為「摭故實，備考索」，「不可不書」，「亦不可遺」的宋前舊蹟⁴²，故其相關敘寫即緣於時代先後，置於該卷之首，唯其文獻資料與篇幅相對於艮岳壽山，則顯然難以望其項背，其中內容大體如下：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之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亦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堅守之處。《史記》云：「夷門，汴之城東門也。」而安遠門乃汴之北門，今北門內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遷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⁴³

除夷門山之外，卷4「山岳」之載敘全部圍繞宋代遺跡艮岳壽山之上，起首為作者李濂的敘寫篇幅，大體十倍於前條「夷門山」，此外，還備錄宋代皇帝、史家、僧人、文士迄至明代時賢的相關艮岳書寫，基本上足資提供豐富的文獻價值，其中主要涵蓋下列著述，依序為宋徽宗御製〈艮岳記略〉、僧祖秀《陽華宮記》、張昞《艮岳記》、無名氏《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洪邁《容齋續筆》、周密《癸辛雜識》，與明代和維《愚見紀志》、岳珂《桯史》等。

值得注意者，如李濂將本人文字置諸於宋明兩代前賢時彥的艮岳篇章之前的書

⁴¹ 參見清·周城：《宋東京考》，頁3-5。又可參考書前所附今人單遠慕〈點校說明〉。

⁴² 參見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凡例》，頁1。

⁴³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54。

寫現象觀之，宜其展現作者撰述此書的主體性之外，儼然反映出他意圖以明代汴京史家新雄之姿，為宋代艮岳遺跡書寫集其大成，從而在稽古拓今與文史競合互証的變創著述體例上，打造明代汴京史學書寫新範，其中卷 4「艮岳壽山」即為其具體而微的註腳與印證。

李濂新版改寫的「艮岳壽山」內容，主要依序建構在宋徽宗建築艮岳之緣起、艮岳景點及其方位地形的佈置、花石綱事要、艮岳之命名改寫、艮岳建城之君臣對話，終篇則以金人圍城與艮岳崩毀作結。從上述敘寫脈絡加以考察，李濂應是主要廣泛參閱該卷末尾所備列的宋徽宗、祖秀、張悞等三人之史學文獻，故李濂的敘寫內容與旨趣大體皆得以與此三家著述相契互證，其中尤以張悞《艮岳記》為主要書寫依據，其中理由首在張悞自敘其撰《艮岳記》已頗取材於宋徽宗、祖秀與其他相關著述：

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制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陽華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⁴⁴

文中所謂「各摭其略，以備遺忘」實際上亦為李濂「艮岳壽山」條下，略錄宋徽宗及張悞等人著述的書寫踐履；其次，李濂敘寫艮岳的建造緣起，從現存史料文獻觀之，亦主要見諸張悞撰述裡，即張氏所謂「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而李濂文首引道士之言與艮岳因緣謂：

艮岳泰山在汴故城東北隅，初，徽宗未有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樣。」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於是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既成，更名曰艮岳。⁴⁵

而李濂所引錄「張悞〈艮岳記〉略」則載：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

⁴⁴ 參見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 4，頁 61-62。

⁴⁵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 4，頁 54-55。

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⁴⁶

對照張昞與李濂前後二人的艮岳建造緣起敘寫，其間脈絡旨要大體如出一轍，然則就此而論李濂之「艮岳壽山」書寫，似乎主在拮拾剪裁前人舊說，雖偶見增刪，但史學新意似乎難以明顯展現；至於其後論及艮岳「周迴十餘里」的風光勝景，乃至於「花石岡」、及其「神運」等事，亦頗詳見於徽宗、祖秀與張昞三人之撰述。則作者李濂之史學新意究竟何在？誠待進一步探索。

李濂冠諸前賢撰述之首的「艮岳壽山」敘寫，其中明顯未見於前述張昞等三人之引錄文字中者，主要為宋徽宗與蔡京之子攸關艮岳的一段君臣對話：

宣和六年，有芝產于艮岳之萬壽豐峰改名壽岳，一曰壽山。時蔡京之子蔡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豈徒自勞苦哉。」而帝數微行，因令苑囿多為村居野店，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帝晚歲患苑囿之眾，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⁴⁷

李濂此一深涉艮岳樂遊與社稷興亡論述，為其「艮岳壽山」書寫異於宋徽宗、祖秀與張昞之重要樞紐，亦為作者撰述《汴京遺蹟志》的重要情志關注，惟李濂行文大體仍以客觀敘寫為主，並未見縱橫捭闔地大肆商榷與論述，但仍宛轉蘊藉地流露士人緬懷鄉國之歷史興亡觀照，適如他在《汴京遺蹟志》的序文與凡例等處不一而足的重申力闡：

所愧聞見褊陋，蒐羅疏略，引括靡周，詮次無法，……聊亦摭故實，備考索，書慨惋，資譚噓，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乃若區區刪定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⁴⁸

⁴⁶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61。

⁴⁷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56。

⁴⁸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序》，頁2。

故都名臣、宦業、人才、物產、風謠、俗尚，不錄者何？曰：「吾志其遺蹟而已矣。它何知焉。」雖然，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于其中矣。⁴⁹

對照上述李濂於該書序文及凡例等處，念茲在茲以興亡治亂為旨諦的史學關懷，應為其「艮岳壽山」敘寫的首要深層底蘊，況且如是涉及古今興亡成敗之史鑑意識，又益形徵諸他於該卷所引錄無名氏之作《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宜其當為李濂深寓艮岳樂遊與北宋興亡旨趣的重要參考依據，例如：

徽宗取敗之道固始於蔡京「豐亨豫大」之對，然致天下之騷動，戎虜之憑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石綱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又為苑囿，白屋不施五彩，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又聚野獸禽鳥於苑囿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嗟乎，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今寇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修政，不亦晚乎！向始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勔，……絕愉目之奇玩，救勞苦之生民，則粘罕、幹離不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肆跋扈而蹈我中國哉。惜乎，徽宗悔悟已晚，噬臍無及，顧雖有改轍之心，而莫能為謀矣，悲哉！⁵⁰

《宋史筆斷》的此段內容及其文字，與上述李濂「艮岳壽山」書寫形神相契，脈絡一體，則李濂之文理深受其啟發，並從而脫胎變創，誠然歷歷可證。由此觀之，他在《汴京遺蹟志》序文及凡例屢見揭櫫的「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別寓其中」，若從艮岳書寫之具體案例觀之，作者之敘寫與其引錄之相關古今文獻，誠為一隱一顯與互涉互證的表裡呼應關係。換言之，宋徽宗以下迄至明代時賢的艮岳書寫，不僅作為李濂《汴京遺蹟志》的主要史學文獻及其書寫依據，同時又與作者之敘寫相互發明。而如是深寓其中的史學書寫取向，亦別闢蹊徑地以變創之姿，展現《汴京遺蹟志·藝文》與《汴京遺蹟志·山岳》文與史競合建構，於是二者的艮岳書寫，遂體現該書「山岳」卷帙藉由史料文獻重返北宋艮岳現場的時空還原，與「藝文」諸卷，以後世詩文巡禮艮岳並憑弔北宋的歷史懷思基調。然則此即為李濂《汴京遺蹟

⁴⁹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凡例》，頁1。

⁵⁰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62-63。

志》艮岳書寫及其史學與文學合流的主要具體著述特色。

《汴京遺蹟志》關涉艮岳書寫的「山岳」史料與「藝文」文獻的書寫異趨，固然大體如是，而兩者間之主要交集，則為作者李濂於自序與凡例裡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於其中矣。」故從卷 4「山岳」之敘寫，及其依朝代先後排比的眾多艮岳載記，例如《宋史筆斷》以「花石綱之害」為題，論述其中興衰治亂與成敗得失的歷史脈絡，相形之下，包括李濂與宋元明相關史學載述，大體仍以艮岳攸關興亡盛衰的歷史表相，及其中人物掌故為主要內容，殊少鋪陳「一代興衰治亂之故」，而轉以春秋微言大義的史家筆法，巧妙地「寓於其中」。由是觀之，宋代無名氏所撰《宋史筆斷》的艮岳敘寫，不僅宜為李濂「壽山艮岳」取經鎔裁之一主要憑藉，並且益形重要的乃在此一異於宋明諸家書寫的獨特史論，適為李濂艮岳書寫的關鍵註腳及旨歸所在。換言之，《宋史筆斷》既集中體現《汴京遺蹟志》的重要書寫要諦，亦同時對照出李濂之史學觀照及書寫筆法，並且以客觀史料現身說法做為主要基調。

至於《汴京遺蹟志》該書後半涉及艮岳的「藝文」文獻，則是李濂藉由宋、明士臣文人的詩文作品，映現以文證史進而以文代史之著述旨趣。故從其主要文類書寫大宗詩歌加以考察，作者顯然有意藉由此一古今書寫隊伍及其文學群體傳世的豐碩篇章，並以文學代言史學之姿，具體勾勒並傳揚歷代文士筆下的艮岳觀照，從而以歷史憑弔及其文化巡禮的書寫身影，洞鑒其中緬懷北宋艮岳所興發寓託的「一代興衰治亂之故」。

《汴京遺蹟志》的古今「藝文」書寫，兼融古今，其中宋人詩歌則大體未見艮岳書寫，今依該書卷次勾勒其中主要作品如下：卷 23 元人雅琥〈汴梁懷古〉、李兩山〈汴京懷古〉、卷 24 元明善〈題萬歲山圖〉、李孝先〈艮岳〉等四篇。由相關文字敘寫，例如：

花石綱前麋鹿過，中原秋色動關河。欲詢故國傷心事，忍聽前朝皓齒歌。有草有風嘶石馬，荊榛無月泣銅駝。人間富貴皆如夢，不獨興亡感慨多。⁵¹

⁵¹ 元·雅琥：〈汴京懷古〉，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 23，頁 458。

滄海成田艮岳荒，誰能行役不徬徨？青城北狩隔萬里，花石南來知幾綱？土暗塵昏天水碧，風輕雨過女真黃。無人可語宣和事，九帝陳留酌一觴。⁵²

萬歲綱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昂藏如畫圖。⁵³

一沼何堪役萬民，一峯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⁵⁴

由是觀之，元代詩人已然在艮岳書寫上，開啓攸關「一代興衰治亂」的「江山論述」，至於前此之宋代詩人的艮岳書寫，固然未得由此書之「藝文」諸卷按圖索驥，並一探究竟，但所幸仍可藉由前述卷4「山岳」所引宋人諸家筆記略窺其貌，例如《宋史筆斷》除直接大肆剖陳其間之興亡治亂及其成敗得失外，亦不乏於客觀敘寫之中，字裡行間別寓興亡盛衰之理者，例如：

宣和間，朱勔挾艮岳花石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都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閔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⁵⁵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大顯。至宣和間，艮岳之役興，連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封侯，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⁵⁶

至於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中之宋代詩歌未見艮岳敘寫者，其中關鍵或以其地對於宋人而言乃皇宮禁院，一般文士或市井小民固自難以涉足，是以宋代罕值其人，宜其未及廣泛展開編述，相形之下，北宋亡國之後，汴京江山悄然變色，元代詩人來去自如，故能就艮岳史事漸次展開攸關興亡治亂之史學論述。此外，李濂於此書藝文系列的詩歌卷次，更汲汲經營於將明代前賢及其本人的相關作品編錄其中，作為其迥異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纂述之筆，非長於文學者」的編撰特色，展現文學與史學兼善並美的閱博才學，從而以後出轉精，新變代雄的學術志業，完成並彌補他對於一代帝都汴京缺乏歷史文獻的當代文化遺憾。

⁵² 元·李兩山：〈汴京懷古〉，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3，頁460。

⁵³ 元·元明善：〈題萬歲山圖〉，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4，頁489。

⁵⁴ 元·李孝光：〈艮岳〉，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4，頁490。

⁵⁵ 參見宋·洪邁：《容齋續筆》條，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62。

⁵⁶ 參見宋·周密：《癸辛雜識》條，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山岳》，卷4，頁62-63。

六、懷古與寫史：《汴京遺蹟志·藝文》所見 明代詩歌之艮岳書寫

就宋代汴京遺跡的艮岳史事書寫而言，《汴京遺蹟志·藝文》所蒐錄的相關詩歌主要首見於元代雅琥、元明善、李兩全、李孝光等人的創作，但數量畢竟相當有限，相對而言，明代詩人的艮岳書寫則成果頗為豐碩，而且遍及各類詩體，乃至擴展到長短句一類詞篇。此一創作現象固然反映出明代詩人不乏熱衷於復古思潮之一文學風尚側面，同時亦進而展現其緬懷宋代遺跡，油然觸發思古幽情之外，往往別寓「一代興衰治亂之故」於其中，故《汴京遺蹟志·藝文》中明代詩歌之艮岳書寫，無論在質與量上皆遠遠超越元代詩人總體的創作成績，並且具體藉由明代詩人群體及其艮岳書寫系列，進而成爲作者李濂《汴京遺蹟志》爲一代帝都汴京撰述專門史志，並以「補鄉國之闕文」的書寫旨趣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區塊；換言之，李濂顯然意圖藉由明代文士的當代「藝文」書寫，參與汴京古往今來及其興衰治亂的歷史書寫，故既一方面上溯宋朝前後的歷代敘寫，另一方面又熱衷作意於蒐集明代開國以來前賢時彥，甚至於李濂本人豐富的相關創作，體現並完成其以鄉國情懷參贊汴京歷史書寫的士人不朽志業。

《汴京遺蹟志·藝文》中明顯涉及艮岳書寫的明代詩作，依序包括卷 21 李夢陽〈艮岳十六韻〉；卷 22 李濂〈登汴故城有懷宋事〉；卷 23 顧祿〈汴京弔古〉、李濂〈汴京懷古二首〉、〈艮岳懷古二首〉；卷 24 李濂〈汴川懷古五首〉、于謙〈宋官〉、李夢陽〈春日遊三山陂〉、李濂〈汴州懷古四首〉。此外，頗值得關注者爲卷 24 末尾，李濂特別蒐錄他自己多闕詞體長短句創作，包括〈賀新郎·汴京懷古〉、〈沁園春·艮岳懷古〉、〈滿江紅·于少保祠〉、〈臨江僊·夷門懷古〉、〈柳稍青·梁苑懷古〉、〈西江月·汴京懷古二首〉、〈浣溪沙·汴京元夕〉、〈憶王孫·秋日登吹臺二首〉。其中〈賀新郎〉、〈沁園春〉、〈西江月〉等篇皆具體涉及艮岳書寫。由上述《汴京遺蹟志》蒐錄之諸艮岳詩歌創作觀之，明代文士大體皆以「懷古」爲創作基調，且於憑弔巡禮之外，每每於「抒慨思」之餘，別寓興衰治亂之歷

史省思，而上述主要代表詩人李夢陽與李濂二人，頗以詩友相接⁵⁷，彼此經常聯袂於汴京遺跡之際，每亦不乏同聲相應的融合憑弔懷古與興亡治亂之思的詩歌書寫系列，艮岳即為其中之重要一環：

城北三土丘，揭嶂對堤口，黃蘆莽瑟瑟，疾風鳴衰柳。云是宋家嶽，豪盛今頹朽。我聞帝王富，東京實罕有。鑿池通嵌竇，移山媚戶牖。岌嶭樓觀合，歛吸風雷走。崖陰翡翠吟，海窟蛟鼉吼。燕趙矜麗人，搜剔充妃后。君臣互沈湎，斯道詎能久？嗚呼花石費，銖銖盡官取。北風卷黃屋，此地竟誰守？迢迢五國城，二龍回其首。向使任忠良，邦國得減否？余來值寒暑，悲歌坐林藪。狐狸竄古壘，破瓦沒藜莠。孤城峙我前，蒼蒼日將酉。⁵⁸

宋帝平川起碧山，綺甍瑤殿綵雲間。祇矜花石來江艦，詎料金兵入漢關。北狩竟隨雙雁去，中原無復二龍還。傷心一掬青城淚，灑向遺宮草樹斑。⁵⁹

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峯巒十里餘。朱劬自能移閬苑，道君何必夢華胥。千夫石至龍黃怕，萬歲山成切紫虛。謾向舊都尋舊蹟，絳霄樓觀總丘墟。⁶⁰

其中李濂〈艮岳懷古二首〉之「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峯巒十里餘。」一聯下，作者附以小自注文謂：

宣和初，道士劉混康言：汴城東北地協堪輿，宜增築高阜，當有多男之祥。⁶¹

由於作者以注文不憚其煩地借用宋代史事文獻為其艮岳詩歌作箋，誠然流露其以文寫史，與以史輔文的書寫意識，然則李濂《汴京遺蹟志》文學與史學合流的文化意蘊亦由是得以映現；其次，明代的書寫取向，亦由此可以略窺其貌，故除代表詩人李夢陽、李濂之外，即如于謙以〈宋宮〉為題的詩歌，亦不乏取材艮岳並綰結此類慨思於其中：

龍樓高處綵雲飛，艮岳才成事已非。寂寞長門金鎖合，中州無復二龍歸。⁶²

⁵⁷ 參見清·張廷玉：《明史·李濂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86，頁7360。

⁵⁸ 明·李夢陽：〈艮岳十六韻〉，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1，頁420。

⁵⁹ 明·李濂：〈艮岳懷古二首〉，《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3，頁466。

⁶⁰ 明·李濂：〈艮岳懷古二首〉，《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3，頁466。

⁶¹ 明·李濂：〈艮岳懷古二首〉，《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3，頁466。

由是觀之，明代詩人之艮岳書寫大體藉由汴京遺跡之巡禮憑弔，並出之以「懷古」為題的詩歌，誠然每可以洞燭盪漾於文字之間，攸關一代興亡治亂之歷史慨思，其中作者李濂尤以豐富的諸體詩歌，成為展現此一史學觀照的首要代表詩人，而他此一充分體現文學與史學合流的著述意圖，更可驗證在該書「藝文」卷末所增附的李濂長短句詞篇作品裡，並且此一獨特增闢的書寫專欄，不僅安排在《汴京遺蹟志》末卷的特殊位置，其中應與作者李濂意圖以「藝文」作為編纂《汴京遺蹟志》「抒慨思」以外，別寓「一代興衰治亂之故」的終極旨諦；故此一長短句體卷帙與現象之特殊，復在其異於前此「藝文」諸卷於明代諸家詩歌之外，每以李濂已作終卷，而是集中專錄作者以懷古為主題的長短句體，並且這類作品的內容及旨趣，顯然較諸前此諸卷散見的李濂詩作，在憑弔懷古之外，明顯寓寄「一代興衰治亂之故」的史學旨趣，例如位居其首並攸關艮岳書寫的〈賀新郎〉與〈沁園春〉兩闕詞篇，雖分別以「汴京懷古」、「艮岳懷古」為其主題，然卻更為酣暢淋漓地展現作者融合文學與史學於一爐的首要著述旨趣：

四野平如掌，上荒城、憑高眺望，秋容肅爽。廢殿遺宮何處是？極目風煙莽蒼。艮岳下，牧兒來往。一代興亡真大夢，恨當時，京、劬貪天賞，興土木，斥忠讜。宋都往事增悲慨。更愁聞青城邀駕，括金空帑。二帝蒙塵沙漠去，回首中原板蕩。聽滿路、胡笳哀響。汴水東流還似昔，問鑾輿何日還華壤？悲舊蹟，動遐想。⁶³

十里青山，百道流泉，艮岳巧哉！羨芙蓉城闕，飛亭灑雪，海棠臺榭，絕壑鳴雷，萬態奇峯，百花窈窕，一片平原錦作堆。真如畫，有巖巖紫翠，樹樹琪瑰。東京舊事堪哀，恨誤國姦臣釀禍胎。昔道君開苑，毒逋四海；蔡京入相，濁亂三台。巢鳳樓前，濯龍峽口，鉦鼓喧天金虜來。煙塵起，慨鑾輿不返，弔古徘徊。⁶⁴

這兩闕詞作，故不乏鋪采摛文的艮岳風景書寫及其歷史追憶，映現文士憑弔懷古幽情之外，復以論述評驚興衰治亂之故為基調的史家身影，從而彰顯出《汴京遺蹟志》

⁶² 明·于謙：〈宋宮〉，見於明·李濂：《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4，頁492。

⁶³ 明·李濂：〈賀新郎·汴京懷古〉，《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4，頁498。

⁶⁴ 明·李濂：〈沁園春·艮岳弔古〉，見氏著：《汴京遺蹟志·藝文》，卷24，頁498。

以「藝文」懷古，同時復以「藝文」寫史的著述要諦，並成為作者李濂於該書序文與凡例裡所謂「書慨惋，資譚噓」之外，「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其中」的重要註腳，兩者之間可謂形神相契，互為表裡。由是觀之，獨特別錄於《汴京遺蹟志》末卷之卷末的李濂長短句汴京懷古、弔古書寫系列，固然在作品數量上，較諸前此「藝文」諸卷的明代諸家或作者本身的詩歌總體，難以望其項背，但由於獨特的詩歌體類及其創作風格，乃至於編纂次第之安排，尤其作為展現李濂《汴京遺蹟志》以自我「藝文」代言歷史及其書寫歷史的著述意涵而言，誠然值得重視。

七、結論：《汴京遺蹟志》——李濂以文代史的帝都追憶與方志書寫

明代李濂《汴京遺蹟志》之著述旨趣，據其序文自述，固在作者面對兼具前代帝都與世居鄉國的汴京故城，缺乏專門史志可供閱讀的文化憾事，乃力圖集其平生心力亟思彌補與實現夙願，並在仕宦浮沉的人生風波後，念茲在茲，卒獲成就的汴京史學功業。故對於作者李濂而言，這本足以「補鄉國之闕文」的歷史著述，據其自序所述，固然有意藉由此書於致仕告退之後，用資「消山林之長日」，因此從表面而言作者儼然以瀟灑出塵之姿雲淡風輕地自我解嘲，實質上應不無藉此為自己打造以帝都史志成就其立言不朽功業的深層學術意蘊⁶⁵，亦即與其自序所著明揭櫫的「然則，圖籍之在寰宇，抑豈可少哉！」之史學志業互為表裏。

此外，由於李濂自少本淡泊舉業，卻力學博覽，故涉獵富廣，文史兼擅，從《汴京遺蹟志》的內容與旨趣，迄至李濂的諸卷按語及詩文篇章，亦可略窺其貌，因而此書不僅展現作者文史兼美的學術風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者，乃在作者面對當代汴京無志可讀的文化困境下，毅然以「補鄉國之闕文」自任，並且前後歷經數十年波折，方克卒志，其中尤難得可貴者，更在李濂不僅將文學與史學兼容並蓄，並且

⁶⁵ 參見明·李濂：〈三不朽辨〉，《嵩渚文集》，卷44。

前後分別以史志與「藝文」互補互證，其中就「藝文」而言，由於蒐錄歷代前賢時彥及其本人的詩文書寫，並且高據全書半壁江山之卷次與篇幅，從而形塑其史學與文學合流下，以文證史迄至以文代史的著述旨奧，然則此一深具變創意涵的史學著述，亦可由該書自序及內容述及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無足觀者」、「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的汴京史志闕憾敘寫中，管窺其中旨趣。此外，該書大肆藉由明代詩文的蒐錄，尤其全書以李濂本人的詩歌長短句收束，並歸旨於一代興衰治亂之故，益形印證《汴京遺蹟志》融合文學與史學的書寫意圖，進而體現其以文證史迄至以文代史的著述旨奧，從而既可為帝都與鄉國之汴京彌縫前此無志之史學缺憾，同時亦可實踐其立言不朽之士人志業。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梁·蕭統：《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 宋·王象之撰，李勇志校點：《輿地紀勝·前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 宋·宋敏求，張保見校點：《河南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 宋·祝穆、祝洙增訂，施和全點校：《新編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范成大：《吳郡志》，《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
- 宋·張津等：《乾道四明圖經》，《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 明·李濂：《嵩渚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蹟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葉盛：《水東日記·寰宇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明·陳璣：《嘉靖鄆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劉希龍：〈輝志序〉，《嘉靖輝縣志》，《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清·周城撰，單遠慕點校：《宋東京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 清·張廷玉：《明史·李濂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明代傳記叢刊》，臺北：莊嚴文化公司，1997。

二、近人論著

- 袁喜生：〈傑出的學者型出版家李濂〉，《河南大學學報》43：5（2003.5），頁148-150。
- 馮迺郁：〈試論明代《醫史》的編纂特色及學術價值〉，《河南大學學報》43：5

(2003.5)，頁 25-27。